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中国教育科学

Education Sciences in China

2014年

第3辑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科学

ZHONGGUO JIAOYU KEXUE

2014年
第3辑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科学. 2014 年. 第 3 辑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
分会组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107-28450-2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教育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819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328 千字

定价: 3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2013 年创办

每年四辑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编辑部主任

石筠弢

编辑部副主任

韩华球

英文编辑

付 蕾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传真

010-58758991

电子邮箱

zgjykc@ pep. com. 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特 稿

顾明远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教育漫谈/3

大家论坛

郝克明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柱
——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71

张 力 求真务实、不懈耕耘的领路人
——在郝克明教育科研成果研讨会上的
发言/93

师 说

郭 戈 论教育的兴趣/107

陈桂生 “师说”续解/131

课程与教学论

李如密 教学艺术的多维分类、形态解析及研究课题
/151

潘洪建 教学认识论研究：进展、问题与前瞻/165

教育问题研究

查有梁 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193

学术感悟

单中惠 人生有涯 学术无涯
——我的学术生涯五十载回溯/221

2013 年创办

每 年 四 辑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编辑部主任

石筠波

编辑部副主任

韩华球

英文编辑

付 蕾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传真

010-58758991

电子邮箱

zgjykc@ pep. com. 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特 稿

顾明远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教育漫谈/3

大家论坛

郝克明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柱
——中国继续教育的发展/71
张 力 求真务实、不懈耕耘的领路人
——在郝克明教育科研成果研讨会上的
发言/93

师 说

郭 戈 论教育的兴趣/107
陈桂生 “师说”续解/131

课程与教学论

李如密 教学艺术的多维分类、形态解析及研究课题
/151
潘洪建 教学认识论研究：进展、问题与前瞻/165

教育问题研究

查有梁 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193

学术感悟

单中惠 人生有涯 学术无涯
——我的学术生涯五十载回溯/221



顾明远 1929年生，江苏江阴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等称号。香港教育学院、澳门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教育、教育哲学、基础教育等，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培养中外硕士博士60余名。许多著作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获得了多项奖励。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教育漫谈》导读

- 引子：中国教育怎么啦？ (4)
 - 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 (5)
 - 教育本身没有责任吗？ (12)
 - 为素质教育正名 (21)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上） (33)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下） (41)
 - 教师是关键 (51)
 - 尾声 (67)
-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在汲取教育改革历史智慧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前，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许多引起社会巨大争议的焦点问题找不到现成答案，急需教育理论研究给予科学解释。顾明远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亲历者、引领者。最近，他对中国教育的出路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撰写了7万多字的长篇论文。在本文中，顾先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既总结了我国教育改革取得的经验，对当下我国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做了历史性的系统深入反思，又探析了未来我国教育改革的路向，充分展现了我国老一代教育学人可贵的责任感、使命感。现特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教育漫谈

顾明远

【摘要】近年来，教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有些人似乎对中国教育的信心正在逐步丧失。事实上，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影响教育改革的因素很多，如社会文化、制度设计、市场利益推动等，就教育论教育无法回答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困惑。因此，推动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当然，教育内部也需要改革，特别是人才培养模式亟须改革，教师质量也亟待提升。本文倡导“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这是作者本人的教育信条，也是作者对走出中国教育困境的回答。

【关键词】素质教育；教育政策；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教育

引子：中国教育怎么啦？

不久前与朋友吃饭，席间一位女士说，她的孩子原在北京市某稍有名气的小学上学，但是发现学校对孩子管得太多，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许干，觉得这样下去孩子无法发展，只好转到一所国际学校去了。

现在为了规避上述那样管束学生和考试制度，越来越多、越来越年幼的学生选择出国学习。据统计，留学人数 2007—2011 年连续 4 年增长比例为 20%，2012 年达 39.96 万人。^① 还有一部分家长不满于现行的教育制度，干脆不让孩子上学校，在家里教孩子读书。更有甚者，湖北一帮家长联合起来，把孩子带到穷乡僻壤办起联合家庭学校来。

我们的教育怎么啦？家长对我国教育失去信心了吗？

现在教育竞争已到白热化。社会上补习学校如林，各种培训班如麻。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子都要送到培训班学习。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日本住了几个月，发现街上挂着许多“塾”的牌子，觉得很奇怪。后来日本老师告诉我，这些“塾”都是补习班。日本 70% 的中小学生在周日上“塾”补习功课，以便应付考试。所以日本学者称日本教育为“考试地狱”。谁知道回国以后，我发现我国的教育也成了“考试地狱”，也到处是培训班。能不能不让孩子进培训班？不能！家长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上培训班，我的孩子不上，不就输在起跑线上？！”我遇到一位部领导，他坚持不让他的孙子上培训班、补习班，但到了高二，一摸底考试，不行了，顶不住了，不上补习班，将来考不上大学了，只好赶紧把孩子送去补习。

你看我们的教育怎么办？

我们呼吁减轻学生负担。有人说，这是瞎放空炮，负担怎么减轻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硬规定，少留家庭作业。家长不答应，家长增加学生的作业负担。你说，取消奥数班，他来一个数学提高班、兴趣班。名称换了，内容没有变。

大家都说，高考是指挥棒，但谁都不敢把这根指挥棒扔掉。我有一次在一所大学演讲，批评“应试教育”，一位大学生起来说：“我们就是靠应试教育考上了大学，没有应试教育，我们不一定能上得了大学。”高考要改革，也正在不断地改革。但总是有人质疑，考试门类减少了能选拔人才吗？英语社会等级考试能公平吗？高考文理不分科怎么照顾学生的差异和爱好啊？学生学业综合评价能公正吗？高校自主招生能公平、透明吗？一大堆疑问困扰着家长、老师和校长。

^① 《2013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国教育在线，<http://www.eol.cn/html/lx/baogao2013/index.shtml>，2014 年 2 月 28 日。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本文也就是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就教育论教育能走出教育的困境吗？

2007年11月，我在成都市青羊区参加小学生减负座谈会。我说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首先老师要把每一节课上好，让每个学生听懂学会，这样就可以少布置课外作业。其次学校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家长切不要再增加学生的额外学业负担，不要买那么多课外辅导书，不要上那么多补习班。我说，我最讨厌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谁想到我话音刚落，一位小学生举手发言，他说：“顾爷爷，你说不要上奥数班。但是，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将来毕业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怎么养家糊口啊？”这话出于小学生之口，我听了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可叹。这反映了教育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在社会，是社会矛盾在教育上的反映。现在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能够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体面而舒适的工作？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就业并不容易，但是总比没有学历的要强得多。父母这种期望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教育竞争就难以避免。虽然国家明令取消重点学校，也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薄弱校，但重点学校已经在社会上生根，在广大的家长心目中生根，家长还是瞄准几所过去的重点学校。于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家长为了子女的前途，再苦也要让子女上优质学校，将来才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争夺权力和财富是教育竞争的根源，再加上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就加剧了教育竞争。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在后面要一一分析。但是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这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要说教育的病理，这是最主要的病理所在。

下面我们来说说其他的病源。

（一）“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各族人民勤劳勇敢，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艰苦奋斗，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教育，任用贤才，起到了进步作用。儒家学说把培养“君子”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所谓君子，就是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才能。拿今天的话来

阐释,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制度当然比封建的世袭制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并不彻底。科举制度在隋代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摒弃了世袭制和用人唯亲的弊端,它激励庶民百姓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流动,相对公平,同时又鼓励读书,尊重知识,促进了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由于科举是封建社会庶族,也即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出仕的唯一途径,而且一举成名天下知,荣华富贵随之而来。所以社会上广泛形成了“读书做官”“做官发财”的思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曾有一首“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①

《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中举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对科举的狂热追求。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还制造了学历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学历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思想普遍存在。升学的竞争,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追求高学历,不是与科举制度的学历主义一脉相承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与科举考试何其相似。科举考试把知识分子一分为二,考取功名的成为人上人,进入统治阶级;落榜的成为人下人,被人统治。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是科举失败者的悲惨下场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也相类似,考上的出人头地,可以谋取较好的职业,没有考上的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据媒体报道,某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工人,高考的分数比工地上的工程师还要高,但由于地区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差别,考分低的考上大学的成了白领工程师,考分高的没有考上大学成了最低层的工人。这种落差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家长的脑海中。

当然,今天社会的工作在人格上应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在人们心目中总有高低之别,尤其在物质生活上就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不能不促进教育竞争和考试的竞争。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人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我们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读了书就要当干部,当白领。现在不是出现一种“读大学无用论”的思想吗?它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另一面,认为读了大学而没有当上公务员或其他白领而是去卖猪肉,读大学还有什么用?

^① 转摘自王炳照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页。

西方社会则没有这种思想观念。比如，德国的孩子在上完四年基础教育后就开始分流了，根据能力和成绩分别升入主要学校、实科学校、文科中学。主要学校即普通初中，学制五年。其学生毕业以后可进入职业基础学校或全日制职业学校，接受三年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学制六年。其学生在第八学年开始按学科重点进行分化，毕业后获得“中等阶段证书”，有才能的可在第七学年后转入文科中学，一般再接受一年职业教育后就业。文科中学即完全中学，学制九年。其学生毕业后即有高等学校入学资格。这种分流是完全根据学生的能力而定的，他们的家长并没有因为这种分流而有意见或者都上补习班去挤入文科中学。^① 美国则大多是综合中学，设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毕业以后也是有不同的出路。

东方国家则不同，追求升学率、追求名校不光中国很激烈，日本、韩国等也很激烈。这是东方国家较普遍的现象，恐怕不能不说与儒家文化圈的思想传统有关。

（二）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

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君子是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是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但君子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礼记》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孔子就不谈技术，连种田他都不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经批评过孔子不要学生参加劳动。他说：“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② 语出《论语·子路》，原文是这样说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和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是一样吗？古代墨家和名家是重视科学技术的，但是在当时就未成为主导思潮，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之后，墨家和名家更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少数知识分子也从事过科学探索，例如晋代道家葛洪，曾经研究医学、兵法、天文；明代李时珍潜心研究药学，撰写了《本草纲目》，对我国的中医药学影响很大；明末徐霞客走遍中国山山水水，对地理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些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轻视技术的思想却已成为主导思想。

我们常常从出土文物中看到，我国古代已有很高的冶炼技术、制陶瓷的技术，哀

^① 王承绪、顾明远主编：《比较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3—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页。

叹怎么后来都失传了。我想原因是：一方面，统治阶级垄断了这些技术，产品只供朝廷享用，不让在民间流传。例如新中国建立后在江西出土的官窑，发现许多成品都被砸碎掩埋了，就是因为不让这些朝廷的专利品流传到民间。制窑的技术当然更不让流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不传授这些技术，并且蔑视技术。知识分子不去总结这些技术，因而缺乏典籍文献流传下来。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过世，他的技术也就终结，不能流传后世。

李约瑟在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提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李约瑟之问。我想，近代科学没有能在中国产生，不能不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

（三）攀比文化助长了教育竞争

在朋友圈里常常会遇到一种现象，朋友聚会的时候，总要谈起各自的孩子。有的家长谈到自己的孩子考上了清华或北大，表现出无比自豪的样子，另一位家长就会流露出羡慕的眼光。

攀比是教育竞争的推手，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起跑线”在哪里？每个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现在许多家长把“起跑线”设到幼儿园，甚至更早。但是儿童成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我国古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即不能“揠苗助长”。同时儿童生来是有差异的，用一种模式去塑造他，必然会抑制、扼杀他的特长，所以古代就强调“因材施教”。古代的教育著作《礼记·学记》就讲道：“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也悖，其求之也佛。”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的学习，否则就不会成功。《礼记·学记》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学习有四种失误：或者贪多，或者不求进取，或者学得太少，把学习看得太容易，或者遇到困难即停止。这里都是对教师说的，但也是对家长说的。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情况，顺其天性，因材施教。

要知道，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刘翔和姚明的“起跑线”能一样吗？都是运动员尚且如此，不同的专业的“起跑线”更是不同。现在许多父母不管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考虑儿童的差异，从幼儿园就开始让孩子上培训班，盲目地给儿童加重学习负担和压力，不仅不能让儿童健康地成长，而且会抑制他们的特长，造成孩子厌学情绪，反而影响他的正常发展。《光明日报》曾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小倩原本成绩平平，父母为了让小倩能上重点初中，从小倩四年级开始准备，为了及早‘占坑’，孩子休闲活动时间几乎被奥数、英语以及各类补习班占满了。经过了无数次‘选拔’，加上爸爸托朋友、找关系，并花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小倩终于进入了

某重点中学的实验班。但孩子在初中学习的艰难，却让小倩的父母始料不及。进入重点中学实验班的学生大都是各小学的‘尖子生’，小倩时时都能感受到来自同学的压力。此外，重点中学课程进行得特别快，小倩跟不上课堂节奏，常常听不懂。每月一次的‘月考’更是令小倩丢尽了面子，无论小倩怎么努力，排名永远处在倒数前几名的位置。初二时，小倩彻底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每天一睁眼心情就不好，晚上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最后连学都上不了了。父母实在没办法，想让孩子转学，但小倩又不同意，说‘那多没面子，好像是被学校淘汰的’。小倩的父母左右为难，悔之晚矣。”^①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不考虑孩子的具体情况，盲目跟风，后果不堪设想。

家长要找准孩子的“起跑线”，就要了解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不要与别的家庭攀比。其实，这种攀比一般发生在知识分子、富裕家庭中，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较少有攀比心理，也没有条件去攀比。我每个月去附近最普通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的孩子要考大学了。我问她，你的孩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她回答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能考个学校有学上，将来有个手艺有个工作就行了。”知识分子是有理性的，在孩子的教育上真应该向普通劳动者学习。

现在不仅家长有严重的攀比心理，学校也在攀比。重点中学已经不是比一般的升学率，而是比升入清华、北大的升学率，比升入“985”大学的升学率。所以我说，攀比之风不解决，中国只需要办两所大学——清华、北大就行了。

（四）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

社会用人制度对于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不是考察应聘人的能力，而是看他的学历。因此，学历、名校往往被作为用人单位衡量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许多单位有的工作本来很平常，例如秘书等从事行政事务工作的岗位，大学本科生或者高职学校的毕业生就可胜任，但招聘的时候提高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更有甚者，不仅要求高学历，而且要“查三代”，审查你的本科是在哪类学校毕业的。“211”学校、“985”学校的毕业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比比皆是，这种社会用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升学、升名牌大学的竞争，恶化了教育环境。

（五）评价考试制度的指挥棒

有专家给教师培训讲课，教师的反映是：你讲的内容都很好，理念很先进，但我们在下面做不到；评价制度不改革，教育改革难以进行。

评价考试制度是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就实行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同时为了便于工农兵上大学，采取了“调干”制度，从工农兵干部调集一些优秀分子送到大学学习。这种考试招生制度一直延续到“文革”

^① 林红：《“小升初”，家长孩子都需越道心理“坎儿”》，《光明日报》2010年8月30日。

前。“文革”中取消一切考试，1973年高校恢复教学工作，招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于是走后门成风，全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文革”结束后，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主张。这一举措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一扫而光，从此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30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到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为了追求升学率，许多学校让学生在两年内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第三学年围绕着高考反复练习做题。有的学校提出，学生拿到考卷要“一看就会，一做就对”；有的学校采用军营式管理，不让学生有自由喘息的时间。更有甚者，某校把“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然长眠”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口号贴到教室黑板的上方。这些做法，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训练考试的机器。

这种考试的竞争实际上也是社会竞争的反映。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的诟病很多。特别是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无法推行。但大家又认为，高考不能取消，这是唯一体现教育公平的举措，只是必须改革。据悉，国家关于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方案已经制定，不久即将公布，其效果还需实践的检验。

（六）升学率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

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一位据称素质教育示范市的特级教师含着泪水诉说，她那里，去年高考成绩不差，市委书记就宴请教育部门的干部，一面表彰他们的成绩，一面说，明年高考还应比今年更好。教育部门的干部和校长如坐针毡，宴会变成了鸿门宴。

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另外，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有多少教育局长是教师出身的？当然不是说，不是教师出身的就不能当教育局长，问题是他热爱不热爱教育，是不是努力学习教育规律，是不是尊重教师。可以说，不少教育局长是在做官，不是在做教育，有时还对教育瞎指挥。如此，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七）社会诚信的缺失影响教育改革

有人说，“文革”十年贻误了一代人，少培养了几百万专门人才。其实何止一代

人。从思想品德、心理状态来讲,“文革”的影响几代人都难以消失。社会诚信的缺失就是“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前几天我读《国语》,读到“邵公谏厉王弭谤”一节,其中有一句话叫“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①我一下子就想起“文革”时的情境。那时学生暴打老师,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露丈夫,人心惶惶,六亲不认,走路怕见到熟人,生怕因自己“有罪”而连累别人,所以只能道路以目。那时人性被扭曲,互相不信任。“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了,人际关系宽松了,但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造假制假成风,社会诚信缺失,这种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着教育工作。过去,师生如父子,亲密无间;现在,师生是考试分数的关系,学校和家长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互相缺乏信任感。特别是家长对学校的一些改革,缺乏信任,缺乏支持。

教育上一有改革,媒体首先质疑。前几年试行校长实名推荐,媒体马上质疑,会不会暗箱操作?某些学校的腐败更增加了对高校自主招生的质疑。

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讲人情,讲互相照应,使得教育改革特别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步履艰难。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例如国外高校入学需要学生自己申请,撰写几百字的申请书介绍自己,中国学生能做到吗?学校规定学生要参加一定课时的义工,我们有些家长不仅不让孩子参加什么义工,还会拿着纸条请居委会盖章。据报载,这种情况让一位居委会主任很为难,盖章吧,觉得明明是弄虚作假,不盖吧,都是乡里乡亲,磨不开面子。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八) 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辅材料的推波助澜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有关调研表明,小学生请家教的占24%,上补习班的占71%,有的学生参加多达五六个补习班;高三和初三毕业班学生暑假大半时间在学校或补习班上课。这种学习导致中小学生学习长期睡眠不足,许多学生早上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于是身体搞坏了,生活能力缺乏了,人格被扭曲了。

可见,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教育的病源也不在教育本体。教育的病是社会的病的征候,“应试教育”是社会逼出来的。教育的生态环境过于恶劣,教育难以作为。现在是教师觉得无奈,家长也觉得无奈。人们对教育是又爱又恨,都在责怪教育。但

^①《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讲述厉王暴虐,致百姓有意见,邵公劝谏说,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但厉王不听,对朝廷不满的就杀,结果谁也不敢说话。

病源却不在教育,就像一棵树一样,在肥沃的泥土里会长得很茂盛,但如果水土不服,树枯死了,你能怪树种不好吗。20世纪80年代我到广州,看到那里种的米兰又茂又香,非常喜欢,买了两株带回北京。但两株米兰没过几天就枯死了,因为南方潮湿,北方干燥,水土不服。你能怪米兰本身不好吗?

现在大家诟病教育,是教育本身不好吗?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努力吗?要改善中国的教育,就要给教育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此不由得使我想起90多年前鲁迅在北京师大附中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他认为,要有天才,必须有“培养天才的泥土”。我们今天的教育就需要有优良的泥土和泥土精神,社会应该给予它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教育本身没有责任吗?

前面我们分析了影响教育的各种社会、思想根源。那么,教育本身就没有问题吗?教育本身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是在于屈从社会的各种压力,教育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没有自己的“人格”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可见教育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创新。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指出的,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必须改革,还原自己的本真。下面我们来列数一下教育的弊端和失误,以便对症下药,改革取得成效。

(一) 长期以来缺乏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文革”中教育甚至沦为“四人帮”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以后,大家进行反思。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首先对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提法提出质疑。他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说,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他的有关讲话后来形成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发表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由此“教育本质”的讨论就在全中国教育界迅速展开。这次讨论延续了十多年。据瞿葆奎在《中国教育学百年》一书中载,

讨论以《教育研究》杂志为主论坛,1978—1996年全国各类报刊发表讨论的文章约300篇之多。

名谓“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大多数文章谈到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有多种观点:“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等等。^①但这些观点几乎都没有脱离教育工具论的藩篱。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功能的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文革”结束,教育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搞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那么,教育有没有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还有没有其他功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使得我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人的发展的功能,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界“以人为本”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逐渐被官方引用,为教育界所共识。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活动,是人类得以繁衍、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要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资料,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人类要延续,就要生儿育女,让种族延续;人类要发展,就要传播先辈的生存经验、帮助年轻一代的发展。这就是教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教育当然要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发展了,个体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也只有社会成员的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社会服务。因此,个体发展是第一位的,是每个人生存发展的权利,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更是儿童发展的权利。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第44届大会通过第25号决议《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公约》明确提出,儿童(至18岁)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在发展权中,指明充分发展儿童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儿童有权接受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有权享有促进其身体、心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公约》宣布,“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从而确立了“儿童第一”的原则。

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界没有这种“儿童第一”的思想。我们的教育很少考虑儿童

^① 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02页。